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八編25

# 戰後台灣小說 將軍書寫之研究

彭婉蕙·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編輯刊

八 編

第 25 冊

戰後台灣小說將軍書寫之研究

彭婉蕙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台灣小說將軍書寫之研究／彭婉蕙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23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編；第 25 冊)

ISBN 978-986-404-451-1 (精裝)

1. 臺灣小說 2. 文學評論

733.08

104015147

ISBN- 978-986-404-451-1



9 789864 044511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八 編 第二五冊

ISBN : 978-986-404-451-1

戰後台灣小說將軍書寫之研究

作 者 彭婉蕙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9 月

全書字數 219984 字

定 價 八編 29 冊 (精裝) 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戰後台灣小說將軍書寫之研究

彭婉蕙 著

## 作者簡介

彭婉蕙，1974年生，台灣台中人，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著有《論魏晉士人的群我處境與生命衝突——以《世說新語》為中心的考察》（碩士論文，2002年）、〈論《馬蘭的故事》之罪與罰——兼論潘人木小說中的母親身影〉（收入《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7，潘人木》，2012年）等。研究專長：魏晉文學與文化、現代小說、編輯採訪，目前於大學開設編輯實務、文學與電影等課程。

## 提 要

本論文乃探討戰後台灣小說以「將軍」為創作主體、內容涉及「將軍」題材與人物形象之研究。從革命建國、北伐、對日抗戰到國共內戰，身經百戰的「民國將軍」，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除了實際參與的戰爭外，亦因掌握軍權進而涉入政治權力背後更為詭譎複雜的立場、路線、黨派等意識型態的「戰爭」中。這些「民國將軍」，一生擺盪於建國／叛國、殺敵／通敵、戰將／戰犯、回鄉／遷臺之間，形塑成充滿矛盾、辯證的複雜形象。

因此，小說中的將軍書寫必然涉及歷史紀實與虛構敘事兩個面向，將軍既是名留青史的人物，亦是小說中的角色與故事題材，歷史的將軍聯結國族認同、政治威權、階級意識等議題；小說中的將軍則衍生出小說家書寫主體與文學場域交錯的蛛網，越是遠離歷史紀實、越接近小說家虛構的將軍，更能呈現小說家對政治、歷史、戰爭等議題的反思。

本文擬以1949年後隨政府來臺的「民國將軍」為思考核心，考量小說家的身分背景和作品內容後，建構出「將軍書寫」的三個面向：一、以歷史為本塑造的將軍形象；二、將軍與作家交錯而成的生命書寫；三、將軍成為小說文本的象徵性符號，將軍視同為符碼。論文章節亦置於此三個範疇中：第一，將軍的戰役，探討戰場之於將軍的意義，觀察小說家以「歷史人物」、「歷史戰役」為素材塑造作品中的將軍形象；與此相關的章節是「戰後將軍書寫的開展」，討論的小說家有司馬桑敦、王文興與柏楊。第二，針對小說家將軍書寫的系列討論，小說家必須在創作脈絡中明顯具有將軍主題者，甚至透過將軍題材展現個人獨特的文學風格與生命隱喻，論文章節包含第三章「將軍的典範——朱西甯的文學見證」、第四章「將軍的身影——白先勇筆下的最後貴族」以及第五章「將軍的懺悔與救贖——李渝的隱喻書寫」。第三，呈現符號化的將軍，八〇年代後將軍成為一個存在於文本的符號，小說以將軍為喻，凸顯歷史、政治、戰爭甚至具有特定意識型態的寓意，此一階段的將軍，「不存在」於歷史，卻弔詭地因歷史而衍生，最後反過來「見證」歷史變貌，論文章節為第六章「符號化的將軍——八〇年代後民國將軍形象的轉變」，討論的小說家則有蘇偉貞、黃凡、張大春、林文義與郭松棻等。最後，第七章「結論」主要是歸納「民國將軍」在戰後台灣小說創作中呈現的脈絡，八〇年代後「將軍書寫」幾乎都聚焦在將軍退役、老年、臨終的主題上，小說界顯然已經準備好為「民國將軍」送終，迎接下一個世代對將軍的新詮釋。



#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文獻探討	14
第二章 戰後將軍書寫的開展	25
第一節 失去戰場的將軍	26
第二節 域外戰場的將軍——柏楊《異域》的歷史 見證	36
第三節 小結	52
第三章 典範在夙昔——朱西甯的文學見證	57
第一節 朱西甯小說創作與將軍書寫的關係	58
第二節 《八二三注》的軍人群像	64
第三節 《將軍令》的將官典範	89
第四節 朱西甯將軍書寫的意義	97
第五節 小結	104
第四章 將軍的身影——白先勇筆下的最後貴族	107
第一節 白先勇的身世背景與將軍書寫的關係	108
第二節 缺席的將軍	112
第三節 《孽子》的家變與「兵」變	126
第四節 小結	141
第五章 將軍的懺悔與救贖——李渝的隱喻書寫	145
第一節 李渝的成長背景與將軍書寫的關係	146
第二節 從溫州街到域外書寫	152
第三節 將軍書寫下的鉅史與私情	159
第四節 靈與救贖——將軍/李渝的金絲猿	170
第五節 小結	181
第六章 符號化的將軍——八〇年代後民國將軍 形象的轉變	185
第一節 回家	186
第二節 最終所「在」——雕像、紀念碑	193
第三節 歷史的將軍與虛構的將軍	203
第四節 小結	217
第七章 結論	219
參考書目	223

# 第一章 緒論

二十世紀的「將軍」是個複雜的時代「產物」，「將軍」的涵意為何？由軍階、戰爭、歷史、政治，還是文學來決定？尤其在 1949 年兩岸分隔後，來台「將軍」一夕之間加上「渡海」與「戰敗」等文化與政治雙重意義的指涉，抗日名將變成擔負丟失國土與政權責任的敗陣之將，「將軍」之罪究竟是負罪還是替罪？此外，彼岸的歷史創傷未平，島上的新興權貴卻儼然成形，「將軍」涉及權貴——不論舊政權還是新政府——的角色毋寧是更加曖昧。

因此，本論文欲探究的是：渡海來台的「將軍」，在戰後台灣的小說書寫中呈現何種樣貌？足以成爲一個小說類型嗎？「將軍」形象歷經時空嬗變、世代遞移，小說家的創作意圖在文化思潮多音交響下變成流動不居的喻象，於是五〇年代見證歷史、形象單一的英雄，在解嚴後同時被解構。八〇年代後的將軍形象無疑是一個變動、複數的面孔。此後，小說家在歷史裡汲取素材轉化爲文本題材，從紀實擺盪到虛構，這樣的轉變又意味著什麼呢？選擇「將軍」這個涉及歷史與政治面向的人物、題材作爲創作主體的小說家，必然意有所圖；其中隱藏的心迹卻是幽微曖昧，因之，本論文探討的途徑無法侷限在文本分析，小說家的身世與世代也必然有所關連，作者——作品——時代，遂形成「將軍」意義組構的元素，並使「將軍書寫」溢出了文本存在。緣此，小說文本中「將軍」的種種變貌，也同時見證台灣文學在歷史、政治、意識型態多方角力下，錯綜複雜的虛實對映。

##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背景

傅柯說：「我們處於一部分對另一部分人的戰爭之中；戰鬥的前線穿越整

個社會，永無寧息之日，正是這條戰線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放到這一個或那一個戰場上。沒有中立的主體，人必將是某個別人的對手。」〔註1〕在近現代的戰場上，個人的生長背景、知識認同甚至是血緣情感，都顯得相當模糊，戰爭之「線」被擁有發言權的人宣稱：「我們」擁有國家、種族的權利，進而決定該怎麼劃下戰場、敵人與「我們」由此而別，涉入其中之人一旦表明立場（不論主動或被迫），就成為日後歷史敘述上「你是誰」的依據。如同傅柯所言，這是一場普遍、永恆的戰鬥：「敘述歷史的人，尋找記憶和防止遺忘的人，他必然地處於這一邊或另一邊：他身處戰鬥，他有敵手，他為一次特定的勝利而工作……。但他所要求的和宣揚的是『他們』的權利——他說：『這是我們的權利』，特殊的權利，打上了所有權、征服、勝利和自然關係的烙印。」〔註2〕如此一來，當「戰爭」變成指涉經濟、社會、文化、國家與種族之間各種形式的對立或抗爭時，每個人都將因為來自不同的集團階級而被置入「戰場」中，無可逃脫。即使是在和平的時刻，依然會因為制度與社會的二個集團、二元對立（雙方的成員以參與討論、謊言、幻覺、遺忘、防止遺忘等方式加入）已然形成，並在和平中持續「戰爭」的狀態。

以此對照民國以來將軍的中國戰場以及戰後渡海來台的處境，其中特質正是「陣線」比「戰線」複雜，即使是敵人明確、戰爭理由再清楚不過的八年對日抗戰，都有「陣線」立場的問題，更何況是自己人捉對廝殺的戰爭。隨著國民黨在大陸失去政權來到台灣，戰爭之「線」不僅在臺海地圖上畫下一道清楚防線，中國人、台灣人、外省人、本省人更在國共意識型態的戰爭中繼續被畫「線」，甚至被這些一道道的「線」一再劃分，直到面目全非再也不識自己的來歷。緣此，本節擬以「民國將軍」含括此一特殊時空環境造就出來的將軍人物，他們作為小說家「將軍書寫」的歷史「文本」，實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 一、民國將軍

從清末民初的講武堂到廣州黃埔、國民革命軍，「民國將軍」歷經革命、北伐、對日抗戰、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遷臺前的二二八事變、遷臺後的臺海大

〔註1〕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著、錢翰譯，《必須保衛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2版），頁36~37。

〔註2〕 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頁37。

小戰役與 1958 年著名的八二三砲戰，身處民國的將軍，不僅參與對外對內的大小戰役，甚至在每一個歷史階段，因為掌握軍權而涉入政治權力背後詭密複雜的立場、路線、黨派等意識型態的鬥爭中。同一期的將領，並肩抗日，重回國共戰場時卻殊途兩分敵我相對，這樣的例子歷史上所在多有。

考察陳予歡於《天子門生——黃埔一期全記錄》（註 3）對黃埔軍一期生共 706 人所作傳記，發現黃埔一期生絕大多數具有將軍身分，這些「民國將軍」的共同寫照是：橫跨清末與民國、縱橫南北局勢（東北軍 / 滇緬軍 / 北伐東征）、擺盪國共兩岸之間，一生戎馬參與戰役無數，然而，可歌可泣的戰爭經歷，並未能讓九死一生的將軍們都得以安享晚年，多數「民國將軍」戰死沙場、下落不明，或是被敵對一方「逮捕槍決」，戰勝慘烈的抗日，卻躲不過內戰詭譎多變的政局，例如：

朱炳熙（1895～1952）：

1947 年 1 月 7 日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陸軍少將。

1949 年後返回浙江，隱居溫州高公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返回故鄉青田章旦鄉居住，後被當地政府控告逮捕，1952 年 3 月 17 日在橫山村竹林處執行槍決。（《天子門生》，頁 113～114）

朱炳熙將軍的例子是一旦曾經入軍旅身為將軍，將軍身分就是一個「終身職」，即使退役隱居也無法隱藏曾經是國民黨「高層黨員」的事實，最終難逃一死。

李玉堂（1899～1951）：

1935 年 4 月 13 日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陸軍少將。……1941 年 1 月 4 日取得了抗戰史上聞名中外的第三次長沙大捷。……率部參加豫中會戰、桂柳反擊戰，以堅守長沙、常德、衡陽城保衛戰著稱，其中所率第十軍堅守衡陽城 47 天，創抗戰我軍守城時間最長記錄，為當時傳頌抗日名將。

1949 年 6 月 12 日袁州戰役中，所率六萬餘人被人民解放軍全殲，與整編第十二軍軍長霍守義同時被人民解放軍俘虜。被俘後因冒充士兵沒被發現，之後乘機脫逃……隨後在當地漁夫幫助下到臨城，繼而乘火車到徐州，才知道國防部已頒發「永不敘用」的撤察令。

〔註 3〕 以下引述見於陳予歡：《天子門生——黃埔一期全記錄》（台北：知兵堂，2012 年）者，皆於文後標註頁碼，不另註出處。

此後避居上海，後轉投薛岳部任高級參謀。……（1950年）其率殘部抵達台灣新竹，再次撤除軍職，繼又因夫人陳伯蘭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繫而被逮捕。1951年2月5日與其夫人陳伯蘭同被押赴臺北碧潭刑場執行死刑。（《天子門生》，頁133～137）

在剿匪生死不明的慌亂年代，像李玉堂將軍的例子頗多，俘虜後即使被釋放，還是難免有受降成爲間諜的疑慮。此外，受到孫立人、郭廷亮案牽連入罪的新三十八師李鴻、陳鳴人、彭克立、曾長雲等將校級人物，也是因爲剿共期間曾被俘虜，來台後即因匪諜案入獄，渡海來台之將，不因戰敗入罪，反而陷入國民黨主導的詭異政局，從政治的戰場上敗陣下來。還有在大陸被俘虜成爲階下囚，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牢獄，例如，著作等身曾擔任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部副總司令的宋希廉（1907～1993）〔註4〕：

1936年10月5日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陸軍中將。

1949年8月程潛、陳明仁等長沙起義時，中共方面亦爲派人勸其起義，宋以「事關重大」爲詞拒絕。……1949年12月19日在四川沙坪被人民解放軍俘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押于戰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獲特赦釋放。1959年12月10日安排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專員，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93年2月14日因病在美國紐約逝世，其骨灰安葬在長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區」。（《天子門生》，頁198～202）

宋希廉歷經十年戰犯生活，後來因成爲中共政協委員而得以在1980年旅居美國直到亡故。此外，還有身爲戰俘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范漢傑（1896～1976），他是黃埔軍一期生706人當中最早升任團長的三人之一（另兩人爲孫元良〔註5〕、李杲），也是最早升任師長的黃埔一期生，其一生擺盪在國共

〔註4〕 根據《天子門生》記載，宋希廉在大陸出版的著作高達36種，記錄東征、討伐、遠征軍、西南戰區、淮海戰役、南京守城等戰役，此外亦涉及蔣介石、白崇禧、龍雲、李宗仁等人物。

〔註5〕 孫元良（1904～2007）一生和李玉堂頗爲相似，都曾被共軍俘虜。孫元良將軍一生功勳彪炳，陸軍少將時被譽爲國民革命軍的「陸軍模範師」，後升任陸軍中將，並於抗日戰爭中與名將謝晉元死守四行倉庫。抗戰勝利後，卻因剿共期間部眾於四川投共，不得不孤身逃脫輾轉從香港到台灣，和李玉堂這些曾經被俘或是部眾投共的將軍（孫立人部屬李鴻亦是）相同的命運是，皆得到「永不錄用」之令，孫元良從此結束統軍任官生涯，隱居高雄、北投。孫元

兩黨間，最後下場更是充滿戲劇性：

1927年春「寧漢分裂」後，隨陳銘樞、蔣光鼎等去職，1927年夏赴南京，晉謁蔣介石並受到重用，……蔣介石重新上台後，奉派赴日本考察政治、軍事，繼轉赴德國留學，先後在德國多所軍事學校學習。……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發後回國。……1933年參與發起「福建事變」，後任由第十九路軍改編的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蔡廷鍇）部（參謀長鄧世增）副參謀長，兼任參謀處處長。因其黃埔一期生身份，為中央軍分化與籠絡對象，被說服歸附國民政府。

1945年3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銓敘廳頒令敘任陸軍中將。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9月隨胡宗南〔註6〕赴鄭州參與受降和接收事宜。

1946年5月30日任總參謀部（總長陳誠）參謀次長，……1947年6月10日任第一兵團司令部司令官，兼任膠東兵團司令官，率部在沂蒙地區對人民解放軍作戰。

1948年10月14日在離錦州城東南陳家屯路上，被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押于戰犯管理所繼續改造。1960年11月28日獲特赦釋放，分配在北京市郊紅星人民公社園藝隊果樹組一年多。……1964年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1976年1月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其骨灰留存八寶山革命公墓，後被其海外子女取出一半，帶往台灣安葬。（《天子門生》，頁426～431）

范漢傑將軍一生，備受蔣介石重用，當過人民革命軍，之後又重回國民革命軍在抗日時建功，並一路擔任過黃杰〔註7〕、胡宗南、陳誠等人的參謀長，剿共時率部眾與人民解放軍作戰，可說是昔日同僚今為敵我，被俘成為階下囚。

---

良即影視明星秦漢之父，根據陳予歡的調查，除了戰爭中下落不明的少數幾人，孫元良亦是黃埔軍一期生最後一位辭世者。

〔註6〕 胡宗南（1896～1962）亦黃埔一期生，曾與戴笠將軍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三民主義力行社」，時有「中央主力軍：陳（誠）、胡（宗南）、湯（恩伯）」之說（湯恩伯與陳儀有師生關係、情如父子，後向蔣介石告密陳儀投共之意；這段歷史亦被郭松棻改寫成〈今夜星光燦爛〉），抗戰末期，統領20軍40師高達45萬軍隊，是黃埔嫡系最龐大的軍事集團。逝世時追晉為陸軍一級上將。

〔註7〕 黃杰（1902～1995），黃埔一期生，來台後擔任過國防部長、台灣省政府主席，後者任內實施九年國教，積功升任陸軍一級上將。

宋希廉晚年得到平反後，在人民共和國擔任官職，一生依違擺盪於國共兩邊。最富傳奇色彩的是，歿後骨灰竟是一半留在北京、一半由海外子女帶往台灣，「一半一半的骨灰〔註8〕」——身後的渡海，毋寧更像是小說意象，象徵將軍生前被分裂撕開、死後連「所在地」亦充滿爭議的情節，不論此岸或彼岸的墓園，這裡埋的、紀念的是一個曾經為國奉獻——「一半的」將軍。傳奇的骨灰，是將軍顛沛流離、恍惚不明的生命隱喻，不論生前或死後，去處歸處，從來都不由己。「民國將軍」，交錯在國共百年對峙跌宕的歷史中，呈現的儘是一幅幅徽章榮耀下曖昧迷離難掩不堪的身影。

以《天子門生》裡的黃埔軍一期生管窺「民國將軍」形象，實充滿了辯證與矛盾：建國／叛國、殺敵／通敵、戰將／戰犯、回鄉／渡海、革命／反革命、戰功勳章／負罪懺悔、見證／遺忘、少年得志／孤老以終……，將軍深陷民國以來的多場戰役，從革命建國到軍閥割據、從民族戰爭打到國共內戰，每一場戰爭中牽連的不僅是戰事輸贏，更是成敗論英雄下的名聲與歷史定位，而更詭譎的是瞬息萬變的民國政局，沒有人知道自己在當下是什麼樣的棋子，是領兵萬千的將軍、還是為人利用一場的過河卒子，端看戰事結果與歷史詮釋站在哪一邊。

## 二、將軍書寫及其涉及面向

將軍的歷史定位即便到了蓋棺尚不能論定，在歷史功過難明的情況下，致使小說書寫中的將軍形象，只能擺盪在真實與虛構的兩端，其中所顯現歷史與現在的相異時空，更是撲朔迷離。

緣此，以小說文本探討將軍主題所涉及的面向，有以下幾點：

一、就歷史層面來看，當小說虛構書寫遇上歷史的紀實描述時，文學是否真能成為「面對無法發聲的歷史的唯一見證」，〔註9〕由歷史的角度來看將軍，文學的見證對將軍所涉及的歷史、政治的真實性為何？或是小說家書寫的將軍、對於政治與歷史的反思，又有何影響與意義呢？

二、就小說主題與人物經營層面來看，這些渡海來台的「民國將軍」——在小說招魂術下再生的將軍形象、經過時間迷魅渲染演繹的將軍題材，在不同

〔註8〕「骨灰」是劉大任、白先勇、李渝等流亡第二代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意象，更可視為小說中二代父子結構的象徵。

〔註9〕費修珊、勞德瑞（Shoshana Felman）著、劉裘蒂譯，《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台北：麥田，1997年），頁26。

世代小說家相異的書寫中，將軍們以不同的樣貌現身，而這些變貌、現身的方式，背後有何特殊意義？功勳彪炳的「民國將軍」一生皆在戰場，不論是寫實或虛構，在情節的敘述上必然與歷史、戰爭有所關連，甚至當渡海來台的將軍「失去戰場」轉而涉入政治開啓另一個「戰場」時，戰爭小說、歷史小說退場，繼之而起的是政治、新歷史主義甚至是女性政治小說書寫，那麼，從時代／世代變化的角度觀看「將軍書寫」的歷史脈絡，便可發現將軍文學化、符號化以及意義建構與解構的過程。此外，從小說人物的經營來看，情節與角色雖以將軍為主，其實亦涉及將軍的家眷、軍隊與幕僚，後者尤其關乎將軍半生戎馬的生命歷程，書寫將軍很難不聯繫到此類角色，而離開戰爭、軍隊回歸社會與家庭的將軍，還是將軍嗎？從女眷與兒女的眼中，將軍的身影毋寧是另一個「將軍書寫」的焦點，因為這些既主觀又旁觀的人物正是凸顯將軍人物特殊面向的關鍵角色。因此，將軍書寫的特色即在於小說家既寫將軍，亦透過軍官、軍隊、大兵、女眷、後代等角色烘托將軍，即使將軍未出現於文本中，當所有的故事情節都因將軍而起、將軍具有畫龍點睛的關鍵意義時，將軍因為「未曾現身」形成所謂「沒有將軍」的「將軍書寫」文本，這個結構設計本身即富有多重意涵，關乎小說家創作時的別有意圖、亦涉及將軍題材與其他類型小說的殊異，因此，除了需特別留意將軍概念與文本內涵的關聯性外，也希望能從這一類「將軍未現身」的文本管窺「將軍書寫」的樣貌。

三、就小說家之研究來看，由於將軍人物身分敏感且特殊，涉及歷史、政治、軍事與戰爭，非一般人能輕易接觸且可以深入了解，因此會以將軍為主要創作對象、故事題材的小說家，必然與將軍或歷史有特殊因緣，對小說家而言，「將軍書寫」的箇中意義為何？此外，當交錯於真實與虛構、歷史與想像的「將軍書寫」，成為戰後台灣小說一個特殊的符號與書寫類型時，以「將軍書寫」的角度，重新探討戰後台灣小說史中已成典範的小說家與作品，是否可以從作家的寫作脈絡中，找到一個新的觀察面向？以目前所見「將軍書寫」的小說家，可以分為四個類型：其一，小說家本身即具有軍人身分，是軍隊裡將領階級人物，或是可以接觸到將軍的中級軍官與幕僚，由其親身經歷所見所聞寫出將軍的戰爭，或是將軍私下形象與不為人知的故事，以寫作《將軍令》、《八二三注》的朱西甯為例，身為校級高階軍官、將軍幕僚的文職角色，使其在工作上得以親炙將軍，並將與戰爭有關的第一手資料發展成「將軍書寫」的素材；其二是記者、編輯，這一類作家通常亦有軍人身分、

或是在軍中文藝刊物擔任主編，藉由職務之便，能在多種場合近身觀察將軍，甚至透過採訪取得將軍對戰爭的回憶，以此作為小說創作的素材，例如司馬桑敦、柏楊等人，皆是從記者的角度觀察、書寫將軍；其三，身為將軍的第二代，亦是小說家寫作將軍題材的原因，這一類小說家擁有最貼近將軍真實面的視角，書寫將軍毋寧是更貼近自我書寫的部份，例如身為白崇禧將軍之子的白先勇，小說《臺北人》裡的將軍、幕僚、下女，有不少即是平素在白家活動的人物，不過，小說中唯獨不見將軍父親的身影，此一涉及小說家父子關係的討論，更是值得探究的面向，由此亦見作家對「民國將軍」的態度，同時也別有所寄地隱含個人對政治的觀感；最後一類作家，雖然不如前面三類與將軍有直接或間接關連，但是在成長背景中曾經間接涉入政治或軍事的小說家，例如郭松棻、李渝夫妻曾經名列海外黑名單，李渝更是因為溫州街的成長背景，使她得以透過教授、文人等知識分子的角度，以及參入個人對政治、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切身經驗，折射出獨特的將軍形象。此外，這一類小說家當中還有為數不少是對政治情有獨鍾、對歷史有獨特研究癖好，例如張大春、黃凡等八〇年代受新歷史主義影響的小說家。如果將這四類小說家以「將軍」為圓心，就可輻射出一個將軍之於小說家由近而遠的親疏關係，同時也隱隱和小說家的世代、年齡若合符節。因此，從小說家研究範疇來思考，透過「將軍書寫」的視角，是否可以映照出什麼樣的政治、歷史關懷？透過對小說文本的細讀與分析，是否可為重疊於歷史和政治的光影下幽微曖昧的寫作意圖，尋思出不同的可能性。

以下，即以圖表形式，呈現以「民國將軍」為核心的論述脈絡：



此圖表以同心圓形式展現，亦是「民國將軍」從歷史紀實向小說虛構範疇遞移的脈絡。

### 三、論述架構與章節安排

思考「將軍書寫」的特殊性，本論文嘗試在上述的三個取向——歷史取向、小說家取向、小說文本取向基礎上建構論述方法，三種取向亦包括「將軍書寫」的幾種類型。以下，將一一論述本論文嘗試建構的「將軍書寫」之內涵及章節安排。

#### （一）歷史取向

在歷史取向部分，首先是將軍以「本尊」現身，成為小說中的人物或題材，在歷史小說、戰爭小說中尤其常見這一類以真實歷史事件為材料、情節中加入作者想像的表現手法。在五〇年代延續到七〇年代的抗戰文學與反共小說中，將軍史實可以凸顯內容的真實，達到記錄抗戰歷史與宣揚反共信念的寫作意圖，讓讀者從「相信」到「認同」。

以歷史為本，作家略作虛構的寫法，最為獨特的例子是柏楊於 1961 年寫下的《異域》。柏楊在《自立晚報》擔任編輯時，根據地方記者每日傳來的採訪，將滇緬孤軍的故事加以改編，以《血戰異域十一年》之名在報上連載了二個月後，隨即以《異域》之名出版，並造成熱銷，多年來再版不斷。在寫作《異域》之前，柏楊並無滇緬孤軍戰爭現場的親身經歷，之後，為了一償宿願，柏楊於 1982 年在《中國時報》高信疆的企劃下，進入《異域》的「場景」並寫下報導文學作品《金三角·邊區·荒城》，距離《血戰異域十一年》已有二十一年，從六〇至八〇年代，柏楊「異域」一系列的書寫，不論是小說或是報導文學，都可視為「將軍書寫」的歷史取向中，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異數。

以歷史為本的「將軍書寫」中，還有一個表現手法是：只取歷史事件作為故事輪廓，將軍以「姑隱其名」的方式出現，並且在情節敘述中加入小說家個人的虛構，朱西甯的《八二三注》即是個例子。本作品以八二三砲戰為素材，小說中關於中級軍官與下級大兵的故事皆為虛構，唯獨將軍的部份皆有所本，是此類「將軍書寫」相當重要的作品。

將柏楊與朱西甯作為「以歷史為本的將軍書寫」的典範，乃是企圖呈現一個思考：兩者的表現素材雖然源自歷史真實，但是不同的寫作手法、以及

大相逕庭的結果（前者介於歷史與小說的模糊地帶、後者則無有疑義屬於小說〔註10〕），正是說明除了源於小說虛構的成份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寫作意圖與個人內在反思的過程。

## （二）小說家取向

小說家取向的「將軍書寫」，乃源於書寫者獨特的個人成長背景與生命情性，因而對將軍人物發展出有別於前一類歷史取向的內容。「將軍書寫」對作家而言，毋寧更是自我書寫的一部分。和前一類「歷史取向」相較，柏楊的「將軍書寫」帶有「報人」的天職，對讀者有一定的責任與義務；「小說家取向」就是純粹以作家個人為出發點，思考歷史對個人的意義，將軍與歷史的糾葛、背後呈現的意涵以及作家的自我反思，更是這一類「將軍書寫」中作家考量的重點。〔註11〕正因在這一類的「將軍書寫」中作者往往寄託更多個人心迹，因之，將軍是誰、歷史事件之始末，反而不是重點。觀察戰後台灣小說的「將軍書寫」，其中最為特殊、無人能出其右者，是民國將軍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白崇禧身為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抗戰時期兵權僅次於李宗仁，為當時國民黨內最大的地方軍事勢力，完成北伐後功高震主，與蔣介石幾度扞格，甚至與中央軍對峙。〔註12〕身為將門之後，白先勇的家族本身就是一

〔註10〕張堂錡，〈從《異域》到《金三角·荒城》——柏楊兩部異域題材作品的觀察〉，《柏楊的思想與文學》（台北：遠流，2000年），頁286~286。

〔註11〕張愛玲與少帥張學良一段未能有小說結果的「因緣」或許可為參照。在符立中於《中國時報》發表的〈張愛玲與張學良〉一文中，描述到張愛玲去美之後一直有心寫一部和張少帥有關的小說，為這位民國少帥造像，但是「她試圖從趙四或端納（《紐約先驅報》駐華記者）的眼光去寫少帥卻發現此路不通，卻又『not knowledgeable enough to write from any other viewpoint』（無足夠材料從其他觀點去寫）。終究這段歷史蒼茫，對她僅成爲一場『故都春夢』。她那『家世』與『國族』交錯的獨特經驗，要等到《雷峰塔》、《易經》和《小團圓》才得以呈現」。此外，張愛玲對張學良個人的「民國史」、坦承對少帥的「個人偏見」——「浮誇的自由主義者」，「令人不敢苟同」的興趣轉變，也是最後導致《少帥》一書無疾而終的原因。參見符中立，〈張愛玲與張學良〉，《中國時報》2012年2月12日。關於張愛玲對張學良與中國近代史的愛好，可參見司馬新，《張愛玲與賴雅》（台北：大地，1996年）；蘇偉貞，〈記張愛玲「悄然來台」〉，《印刻文學生活誌》創刊號（2003年9月）；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台北：聯合文學，2013年）。

〔註12〕白崇禧（1893~1966），廣西臨桂人，1926年北伐期間出任國民革命軍參謀長，抗戰期間指揮多次著名戰役：徐州會戰、武漢保衛戰、長沙會戰等，訂定抗日指導原則，博得「小諸葛」封號。相關史料參見白先勇《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台北：時報文化，2012年）。

部中國近現代史／秘史；然而，看過多位民國將軍的白先勇，小說中的將軍畫像，卻儘是朦朧曖昧、刻意只取側影背影的殘卷，如同朱西甯的感嘆，「《將軍令》最應是白先勇來寫，其令翁家傳戶喻皆以小諸葛稱之，可見廣受民間崇敬，白氏以其家世，所識將軍何止十員二十員？且必識之甚深，卻何以不為？」〔註 13〕白先勇何以不為？朱西甯以為，此乃五四以後知識分子視官家、從政者為封建特權而刻意不為；然而，白先勇並非不為，從《台北人》到《孽子》（王尚德將軍、傅副師長、團長、排長、老兵、新兵、伙夫與運輸兵，隱然浮現的一支小軍隊），將軍人物與形象，如魅影般蟄伏於小說中，晚近為父親作傳的《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不啻是撩動另一場歷史迷魅。

以將軍為喻，書寫個人生命的小說家，還有李渝。綜觀李渝的小說主題，從 1991 年《溫州街的故事》、2000 年《金絲猿的故事》到 2013 年的《九重葛與美少年》，李渝的小說創作中持續出現軍官與將軍的身影，或者是位居要職掌握過兵權的政治人物，更為特別的是，李渝不斷書寫一個持續十多年不斷蔓延增生的軍官、將軍故事，不僅寫住在溫州街的將軍，也寫住在溫州街——旁觀將軍的我，「將軍書寫」成為其個人的生命反思與自我觀照。如前所述，在這一類的「將軍書寫」中，將軍是誰並不重要，更不需覆案歷史去對號入座，小說家一寫再寫的理由，也許更像一種生命情結。

以「將軍書寫」探究小說家的寫作脈絡，可發現其已成爲作家的生命隱喻，而不再只是一個存在於歷史、小說的人物或題材。「將軍書寫」的小說家們，或多或少都與將軍有些淵源、特殊關係，以本論文涉及的作家為例：柏楊宛如戰地記者收集相關史料的報導視角；朱西甯上校退役，受孫立人、王昇等人拔擢，可視為將軍的門生；白先勇為將門之後，李渝的將軍觀察其實來自於童年的成長經驗、溫州街獨特的人文背景以及海外生活歷程。如是觀之，研究「將軍書寫」的作家身分與背景，不僅可理解其以「將軍」為喻的寫作意圖，更有助於釐清「將軍書寫」在不同時代的變貌。

### （三）符碼取向

這一類型「將軍書寫」作品中，將軍即使是「有所本」的「民國將軍」，亦離歷史、民國戰役相當遙遠，如：黃凡〈將軍之淚〉（1983）、蘇偉貞〈高

〔註 13〕朱西甯〈將軍令〉序，《將軍令》（台北：三三書坊，1980 年），頁 4。